

渤海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BoHai
DaXue



明清时期

高志超 著

伶仃洋区域社会群体与海洋社会经济变迁



辽宁大学出版社

渤海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BoHai DaXue

明清时期

高志超 著

伶仃洋区域社会群体与海洋社会经济变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社会群体与海洋社会经济变迁/高志超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 3
渤海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ISBN 978-7-5610-6021-6

I. ①明… II. ①高… III. ①阶层—社会结构—研究—中山市—明清时代②海洋经济学—经济史—研究—中山市—明清时代 IV. ①D691.7②P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741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沈阳市市政二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9.5

字 数: 18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田章诗

封面设计: 邹本忠 徐澄珉

责任校对: 何 力

书 号: ISBN 978-7-5610-6021-6

定 价: 19.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目 录

绪言	1
一、学术界有关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	1
二、本文研究思路	6
三、本文研究方法、史料运用	7
第一章 伶仃洋及其沿岸地区的区划	9
第一节 自然与人文糅合下的地理区域变化	9
一、伶仃洋海域由狭义到广义的扩大趋势	9
二、气候对海域及其沿岸的影响	19
三、伶仃洋岛屿及沿岸地带的变迁	22
第二节 历史时期伶仃洋区域行政区划的演变	25
一、先秦时期的人类活动	25
二、秦汉至隋唐王朝介入下的开发	27
三、宋元行政区划演变	30
四、明清行政区划的调整	34
第二章 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的海洋开发	36
第一节 海洋开发的人口构成	36
一、省内人口的流入	36
二、外省人口的移居	39
三、人口数量的变化	41
第二节 海洋开发的商业化趋向	46
一、围海造田及其沙田经营方式的演变	46
二、赶海逐利的商业浪潮	52
第三节 不同族群在开发中的冲突与融合	54
一、水陆之争下的疍民寻求社会认同	54
二、陆陆之争下的血缘、乡土认同	57
三、海陆族群的共同信仰：以南海神信仰为例	59

第三章 以海为生的水上族群	63
第一节 漂浮于伶仃洋的疍民	63
一、疍族群群的构成及其与官府的关系	64
二、疍民的农渔业生产	66
三、疍民的商业活动及其与陆地的联系	72
第二节 游离于官民之外的海盗	74
一、海盗的界定及其人员构成	74
二、海盗对伶仃洋海上经济的控制与全球贸易争夺	78
三、海盗与伶仃洋岛屿的开发	81
第四章 明清伶仃洋区域外来因素的介入	85
第一节 西方人进入伶仃洋区域	85
一、西方人的构成及其职业分工	85
二、鸦片战争前西方人的流动与侨居	89
三、中西正常贸易下的双赢	90
第二节 西方殖民者走私的大本营	95
一、鸦片走私者的乐园	95
二、英国殖民者以伶仃洋为走私指挥中心	99
第三节 伶仃洋沿岸官民对“夷人”之心态	104
一、爱恨交加的地方官府	104
二、跨海出国的民众	109
第五章 海疆设防下的伶仃洋区域社会	113
第一节 伶仃洋沿海的军事防务	113
一、明代伶仃洋沿岸卫所设立与分布	113
二、清代炮台、营汛的布防	115
第二节 海上巡哨与国土观念的延伸	119
一、明清海上巡哨的制度化	119
二、海防带动下的造船业兴起	122
三、军队与海洋走私活动	126
结语	131
参考文献	133
后记	147

绪 言

一、学术界有关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

随着当前世界陆上资源的日益匮乏,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未来发展战略转向海洋,对海洋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海洋社会经济史遂成为国内外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

国外有关海洋社会经济研究的著述比较庞杂,这里仅简要介绍与本文关联较大的著作。法国年鉴学派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①一书,用翔实的史料,独特而宏观的视角,全面探讨菲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海域各类人群的海洋性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海洋、陆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的这部著作堪称是20世纪海洋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②则从全球化角度入手,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提出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该书对世界各地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皆具有指导意义。

相较于国外学界而言,国内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20世纪以来,经过中国学者们近二十几年的积极开拓和探索,国内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已硕果累累。厦门大学杨国桢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③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值得效法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最具代表性。杨国桢认为,多数关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远未解决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会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没有改变史学

① [法]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 [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吕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杨国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著有许多,如《海洋人文类型: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实业》(《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等。

工作者以陆地农业文明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他主张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把中国海洋区域——海岸线陆域、海岛和海域作为研究的主体,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厘清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其中的成败和荣辱,经验和教训”。^①

海洋社会经济史所涉及的领域纷繁复杂,它包括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海岛和海洋国土开发史、海洋航运史、海洋渔业史、海港史、沿海及海外贸易史、海路移民史、海防史、海关史等多个方面。按照杨国桢的观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又可分为“海岸带开发史研究”、“岛屿带开发史研究”、“海洋国土开发史研究”、“海洋贸易史研究”、“海洋移民史研究”、“海洋社会组织变迁史研究”、“海洋社区发展史研究”、“海洋科技史研究”、“海洋政策演变史研究”和“海洋思想文化史研究”^②十个研究方向。目前,学术界在上述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各个领域均取得非凡成就。

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张彩霞的《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主要论述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在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触动效果;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海区域的海洋经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主要探析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谭棣华的《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就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形成、开发和经营等问题进行研究;曾昭璇、黄少敏的《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重在考察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的变迁问题,其中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貌特征变化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审视,尤其对沿海地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地貌的变化与人类开发行为之间的联系的关注,发

① 杨国桢:《海洋迷失:中国史的一个误区》,《东南学术》1994年第4期。

② 杨国桢认为:海岸带开发史研究“包括临海地理、港湾、洋流、潮汐、风候的认识和利用,当地的农业与非农业开发,港口、港市的盛衰”,岛屿带开发史研究“包括岛屿的发现和利用,农业与非农业开发”,海洋国土开发史研究“包括海洋捕捞、海水制盐、海洋交通、海洋气象、海底资源的了解和利用”,海洋贸易史研究“包括近海贸易与远洋贸易,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海洋经济圈內相关国家或区域的贸易互动,商品流通与管理”,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中国境内的海路移民与海外移民,海洋移民的回归或反馈”,海洋社会组织变迁史研究“包括渔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移民社会及海洋活动产生的各种血缘、地缘、业缘、神缘组织,海防、海军、港务、海关等政府管理组织”,海洋社区发展史研究“包括沿海地区、岛屿等面向海洋发展的陆地社会经济变迁,‘外向型’经济的成长,乡村的程式化”,海洋科技史研究“包括渔具、渔法、造船与航海技术、海洋自然灾害防治、海水和海底资源开发技术的演进”,海洋政策演变史研究“包括国家和地方性的海洋政策、法令的制定或废止,政策变动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影响”,海洋思想文化史研究“包括海洋意识、海权观念、移民思想、海洋性风俗信仰、海外知识”。见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人深省。^①

海洋航运史：郭松义、张泽咸的《中国航运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可称为一本关于中国传统时期航运史的通史著作，书中系统论述了先秦至近代中国海上航运业演变的全过程，基本展现了中国海上航运业历史发展概貌；陈佳荣等的《七海扬帆》（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也较有影响力。^②另外，与航运史直接相关的船舶制造技术史亦为学术界所重视，相关论著主要有：王冠倬、王嘉的《中国古船扬帆四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该书总结了古代造船业发展的历程，对各个时代代表性船只作了详尽的描绘；张静芬的《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该书具体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海船制造发展与演变的基本进程；席龙飞的《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此书基本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国造船史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它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均可谓为中国造船史研究领域集成之作。

沿海及海外贸易史：沿海及海外贸易史研究领域的论著相对较多，颇具代表性的有陈希育的《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该书以中国海外贸易的交通工具远洋帆船为中心，论述了清代中外造船文化交流与中外贸易，特别是与广州地区海外贸易的关系；关履权的《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全面查考了宋代广州海外贸易出现盛况的原因及其对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等问题；徐德志等的《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陈柏坚、黄启臣的《广州外贸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则属于通史性的贸

① 相关论著有：李燕：《港澳与珠三角文化透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李罗通：《水乡风情——中山风土人情杂谈》，《中山文史》第四十一辑，政协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7年；李平日、乔彭年等编：《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银铠编著：《中山邑史考》第一分册，《中山文史》第37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5年12月；姚晓娜：《澳门走进新纪元》，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李蓓蓓：《台港澳史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东林：《澳门旋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王俊彦：《澳门的故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邓开颜：《粤澳关系史》，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论文方面的成果更多，如刘光永：《清末改革中香洲“免税区”的创办》，《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徐俊鸣：《宋代的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郭在忠：《秦始皇经略岭南越人地区述议》，《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颜章炮：《论台湾归清对海峡两岸社会经济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姜守鹏：《清代前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4期；周珏：《明清时期潮州盐业初探》，《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1期；李庆新：《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等等。

② 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有：东方昆等主编的《江苏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全面介绍了江苏的航运历史；张后铨所著《航运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是重要的航运史论著；张仲礼等的《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论述了19世纪后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外籍轮船公司于清末至民国这段时间在中国航运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易史研究,有益于学人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广州对外贸易史的发展历程及各时期的发展特点;陈东有的《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亚商人行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张晓宁的《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和晁中辰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均为沿海及海外贸易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力作。

此外,关于广州海上贸易的论文有:余思伟的《清代前期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郭松义的《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1983年第4期)、叶显恩的《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颜广文的《晚明时期走私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以广州府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陈慈玉的《以中印英三角贸易为基轴探讨十九世纪中国对外贸易》、^①张彬村的《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南亚水域的贸易优势》、^②张增信的《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朱德兰的《清初迁界令时中国船海上贸易之研究》、^③全汉昇的《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易》、^④等等。

海洋渔业史:有关海洋渔业史研究的论著不多,其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和李士豪、屈若騫的《中国渔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0年)较具代表性。前者主要阐明传统时期靠海为生的渔民不为社会所关注,在朝不保夕的生产活动中,渔民之间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信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认同;后者论古道今,全面论述了中国渔民及其捕鱼用具的发展历程。

海港史:海港史研究涉及与海港相关的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如与海港有关的航道问题,活跃在海港的各类人群的活动,与海港相关的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政策,以及海港周围的海洋文化问题等。黄启臣的《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吕淑梅的《陆岛网路——台湾海港的兴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和杨天宏的《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等书分别从不同

①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出版,1984年。

② 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8年。

③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二辑。

④ 详见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

同层面论及海港史。不过目前尚未见有综合性的海港史专著问世。

海路移民史：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有刘正刚的《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林德荣的《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峡殖民地的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和《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收录的一批港澳台学者的相关论著^①等。

海防、海盗史：主要专著有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王宏斌的《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郑广南的《中国海盗史》（广州：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主要论文有曾小全的《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沿海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刘平的《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林延清的《嘉庆朝借助西方国家之力镇压广东海盗》（《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张增信的《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1567—1644）》、^②顾诚的《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汪敬虞的《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等等。

海关史：近些年致力于中国海关史研究的学者愈来愈多，其中贡献较大的是连心豪，他在《中国海关与对外贸易》，（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一书中论证分析中国海关制度的演变过程，找其原因，究其影响，进而探讨中国历史时期海关制度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互损关系。港台学者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了《中国海关史论文集》，其中亦有一些颇富创见之作。^③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除上述外，还出现一批以海神信仰、海洋活动人群和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它们是：王荣国的《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王元林的《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于运全的《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司徒尚纪的《岭南海洋国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萧凤霞和刘志伟的《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

① 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二辑；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② 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

③ 吴伦霓霞、何佩然主编：《中国海关史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出版，1997年。

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叶显恩的《明清广东蛋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所有这些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进程。

学术界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当然,其中亦存在不足之处。例如,航运史研究多注重中国古代航运的发展过程、大体航线和航运技术的演进,而甚少关心航运具体路线或航运过程中的商人与货物问题;海外贸易史研究鲜有对海上贸易与其他产业关系、海上贸易与沿海民众关系的展开性论述;海防史研究没能很好地将海防与沿海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思考;海盜史研究集中于海盜对沿海社会经济的危害,海盜在明清海洋贸易发展中的利弊,以及历史时期对海盜的防治等方面,却疏漏了海盜与海上社会和沿海社会各类人群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忽略了海盜由陆入海,再由海登陆的过程对沿海社会的影响,等等。

二、本文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来自笔者对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这也正是本文选题的主要原因所在。

其一,秦汉以来,伶仃洋区域海洋性社会经济开始对国内外社会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秦汉时期,伶仃洋沿岸地区中心城市番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之地,已是国内外商品贸易大都会。隋唐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南下,伶仃洋区域社会经济长足进步,以海洋为依托的经济门类显著。两宋时期,伶仃洋区域的海洋性经济产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表现在沿海沙田的开垦,岛屿开发普遍展开,海上贸易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达。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点,而且也是中外友好、冲突、和解与交流的最前沿阵地,直接左右着时局的发展。

伶仃洋区域社会经济地位日渐重要,有鉴于此,现当代学者对该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研究。但是,伶仃洋区域的海洋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单就某一方面研究尚不足以真正阐释其重大意义,笔者认为若能全面系统地把握研究该地区社会经济问题,可对历史时期国内外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交流情况有一全新认识。

其二,伶仃洋区域是海陆两种文明交汇融合之所,同时亦是海陆两种文明矛盾斗争的前沿阵地。秦汉至宋元时期,伶仃洋区域社会经济虽取得了进步,但从整体实力上来讲仍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其生产工具、技术主要来自内陆,因此这一时期可看做是陆地文明向伶仃洋区域灌输,伶仃洋区域吸收、改造陆地文明的阶段。迨至明清至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伶仃洋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显露

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迹象。此时,内陆文明远不能满足该地区社会发展需求,伶仃洋区域已进入大规模吸纳外来文明的阶段。从澳门开埠,到鸦片战争;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伶仃洋区域既是中外矛盾的集结点,也是中国输入近代化思想的重要孔道,来自伶仃洋区域的人物、信息和商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海陆两种文明之间的天平开始向海洋文明一边倾斜。

明清时期既是伶仃洋区域海洋文明发展到传统社会的顶峰时期,也是海洋文明强烈冲击陆地文明的时期,为此增加了研究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史的需要。

其三,在伶仃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殊的自然环境固然对其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正如我们普遍认同的,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伶仃洋区域的人群,其主体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迁徙而来的移民构成。一方面,移民之间、移民和土著之间存在着宗族观念、等级制度和传统思维的差异,相互间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在海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之间又形成彼此相依相存的依赖关系。

伶仃洋区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该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形态纷繁多变,可惜目前学术界于此问题的研究不甚全面,探讨力度显然不够。

其四,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两代,伶仃洋区域各类人群以海洋为依托的社会经济活动内容包罗万象、千姿百态。这其中既有横行无忌的海盗——从王直、曾一本的商盗活动,到张保仔、郑一嫂大规模海上行劫,又有疯狂的走私贸易——从清代康雍乾以前花样众多的走私,到乾隆以后鸦片走私愈演愈烈;既有沿岸地区农业人口的区域内频繁流动,又有商贾的海内外行销;既有国内各类人群之间流血的斗争,又有共抗外侮的同仇敌忾等。上述这些活动不仅影响了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清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对该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变迁进行研究极为必要。

其五,伶仃洋区域在历史时期就享有国际盛名,是国内外商旅猎利对象。时至今日,这一地区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发达之地,是世界瞩目的经济区,其经济地位较以往变得愈加重要,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国家和地方正积极谋划伶仃洋大桥的营建工程,并开始将之付诸于实践,这使人们看到,未来伶仃洋势必在该区域,乃至全国和世界的经济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我们了解、分析伶仃洋区域自古以来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时代的发展或会有所裨益。

三、本文研究方法、史料运用

中国传统史学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注重史料的发掘和文献的运用,本文行文

时有多处问题,如伶仃洋的范围、疍民的群体构成等问题,均需通过大量文献加以考证、辨析。因此,本文在研究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变迁问题的过程中,将以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通过对各种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尽量得出较为合理、准确的结论。

社会史以人为研究主体,经济史强调生产力对上层建筑发展模式的决定作用,这两大理论是本文行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作为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如果忽视人在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活动,诸如文中涉及的疍民、驻军、农商人群、海盗和西方人的经济行为,那么就很难展现历史的原貌。因此,论文以人为主体的,重视人在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考究明清时期生活在伶仃洋区域的各类人群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以及各类人群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再现该时期这一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变迁的轨迹。

当然,除了社会史、经济史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外,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博采众家之所长,对现当代中外学者的观点和见解的吸收与借鉴,也是本论文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在史料运用方面,本文尽量充分挖掘和利用第一手原始史料,明清时期的官方档案、地方史志、名人笔记和家谱族谱,是本文写作过程中所用史料的首选。同时,对于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记述,来华商旅、使团的航海日记和中国见闻等,本文亦加以辩证分析地运用,以校正和弥补国内文献的不足。

第一章 伶仃洋及其沿岸地区的区划

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制约。伶仃洋及其沿岸地区,是中国传统时期主要的海洋经济开发区域,该区域的地理面貌和人文环境,是左右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环境方面,这里有季风的年度变化,有台风、飓风的不定期发生,还有潮汐的规律性变化,以及不停演变的洋底、洋面和沿岸地貌;在人文环境方面,历朝历代人们都对伶仃洋区域^①有所认识、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大重要因素结合,构成了该区域不同时期的区划,为明清时期这一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了历史基础。

第一节 自然与人文糅合下的地理区域变化

伶仃洋及其沿岸地区在自然和人文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地理区域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伶仃洋海域范围的变化,气候对海域及其沿岸的影响,人对沿岸、岛屿地貌的改造,以及伶仃洋岛屿及沿岸地带的变迁。

一、伶仃洋海域由狭义到广义的扩大趋势

伶仃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重视,大约起于宋元之际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②自此以后,“伶仃洋”作为一个地理与人文的概念,受到历代文人学者和官民的关注。

宋元以前,伶仃洋已经是中外商旅使臣出入中国的重要孔道,但文献中并未有伶仃洋的称谓。宋代以前,人们通常将伶仃洋泛称为“海”或“南海”,

① 此处所说的伶仃洋区域,系指伶仃洋及其沿岸地区。

②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4,《四部丛刊》本。

如南朝刘宋时,“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① 这里的浮海入广州,应是指从伶仃洋一带进入广州。至唐代,文献对伶仃洋记载依然以海或南海称之,南海县在“五岭之南,涨海之北”。^② 《新唐书》卷43《地理七》记载的伶仃洋已经略显轮廓,但仍以海进行表述,“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

宋元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从内陆逐渐向海洋移动,中原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往珠江三角洲地区安家落户,至今尚在民间流传的珠玑巷南迁就是源于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的增加,激发了人们认识海洋的欲望。陈佳荣认为,上古时代,中国人对今日辽阔的海洋泛称为“海”;宋元以来,珠江三角洲的人们逐渐对海和洋的认识深刻起来。按照今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那些离开陆地比较远、面积宽广、水深色蓝的部分叫做‘洋’;而那些靠近大陆、面积狭小、水浅且颜色比较浑浊的地方,是海洋的附属部分,叫做‘海’或‘湾’”,当然这一认识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③ 南宋末年,文天祥写下《过零丁洋》一诗,说明当时人们对伶仃洋已有一定的认识。

明清时代有关伶仃洋的记载明显增多,并在其称谓中产生了对伶仃洋海域范围的某种微妙变化,明英宗时刊行的《大明一统志》卷79提及伶仃洋时称:“宋文天祥诗零丁洋里叹零丁,即此”,没有明确伶仃洋的地域范围。明末清初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3《山语》在“官富山”条下记载说:“文丞相诗所云,零丁洋里叹零丁,是也。”康熙中叶刊行的《新安县志》卷1《舆地》记载伶仃洋时称:“宋丞相文天祥曾经此,有诗。”可见,伶仃洋称谓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诗有着莫大关系。可是,清康熙之后,文献关于伶仃洋记载却少有提及文天祥的字样,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加以运用。至于“零丁洋”这一称呼,在清代多被写成“伶仃洋”,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因史料匮乏,尚不能确定。^④ 但从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这两者之间相同的水域来看,应该可以肯定是同名异写。

明清以来,人们对伶仃洋的关注较以往更为强烈,有关典籍频繁出现零丁洋或伶仃洋的记载,虽然当时人们对伶仃洋的范围仍没有明确的范围,但却为我们探究伶仃洋的范围留下了分析的依据。

① 《宋书》卷1《本纪·武帝》。

② 《旧唐书》卷41《地理四》。

③ 陈佳荣等:《七海扬帆》,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第18页。

④ 明末茅元仪:《武备志》卷240,收录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描绘了郑和下西洋时的航海图,图中将其经过的外伶仃岛记为“冷汀山”,这可能是最早记载伶仃岛的文献。

对于伶仃洋海域的范围问题,至今仍在学术界存有争议。^①其实,这一问题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也一直存在。这一现象的存在,与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伶仃洋的认识有关,说到底,就是对伶仃洋产生了广义和狭义之不同认识。

明清以来,各类史书对伶仃洋方位多有相关记载。这些记载由于编著者选择的地理视角不同,在表述上也就出现了差异。一些史书以伶仃洋之西的香山为参照进行表述,明英宗时纂修《大明一统志》卷79记载:“伶仃洋在(香山县)城东一百七十里”,这里明确了以香山县城东一百七十里为伶仃洋。作为地方文献的嘉靖《香山县志》卷1《风土志》对伶仃洋的表述也是以山为标志,“零丁山下有零丁洋”。这一以陆地为参照的观念,也被清初士人所接受,《明史》卷45《地理志·广州府》记载:香山在府南,“南滨海,东有零丁洋”,将香山的地理位置定位在广州府之南海海域,强调其东有伶仃洋,显然这些表述是以香山县的陆地为参照,将其东面水域称为伶仃洋,但此种表述仍相当模糊。

另一种记载是以伶仃洋之东的新安县为参照来划分伶仃洋的范围,康熙时,杜臻奉旨巡视海疆为展界开海做准备,他在其所作的《粤闽巡视纪略》卷2记载:“新安城南水程二十里至伶仃山,山外即伶仃洋。”康熙《新安县志》卷1《舆地》记载说:“零丁山,其下即零丁洋也。”同治时陈澧修撰的《广东图说》卷13《新安》记载说:“零丁山,城西南七十里赤湾海中,四面环海,下为零丁洋。”《清史稿》称,新安“东、西、南三面滨海,海中有零丁山,其下曰零丁洋”。^②这里是以新安县为参照,将其西部海域中的伶仃山水域确定为伶仃洋。

然而,不管是从伶仃洋的东部香山还是从西部新安来看,都涉及伶仃山问题,即伶仃山下为伶仃洋。那么伶仃山在何处呢?明末陈恭伊在《独漉堂文集》卷11“零丁山人李成宪”中称:“零丁山者,南海之岛屿,浮没风涛中,悲凉寥落。”乾隆时修纂的《澳门纪略》中给出的答案则较为清晰:“零丁山,东莞、香山、新安三邑划界处,下为零丁洋。”伶仃山虽然已经明确,但是称伶仃山下为伶仃洋,伶仃洋的范围依然十分不清楚。

那么伶仃山下又是何指,即“下”应该是指那些区域?这些区域有无岛屿标志或其他标识?我们认为,这里的“下”在地理方位上其实就是伶仃洋的南

^① 赵焕庭认为,伶仃洋呈南北走向,从湾头虎门沙角至湾口桂山岛,长70公里,湾头沙角处宽4公里,湾中腰唐家至赤湾间宽27公里,湾口澳门至香港间宽达58公里。刘兆伦认为,伶仃洋在虎门口处宽4公里,“香港——澳门宽约65公里”。郑集思认为伶仃洋范围“北起东莞虎门,南至香港大屿山,西至澳门”。参见王明远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6页。

^② 《清史稿》卷72《地理志·广州府》。

北界限问题。清中期以前,人们对伶仃洋范围认识出现了老万山岛屿,两广总督李侍尧说,“香山县属之老万山兀处大洋中,与澳门南北对峙,为来往商船停泊总汇。”^①老万山的出现使这一区域逐渐清晰,老万山以内为伶仃洋的观念开始流行,道光时期,魏源在《洋艘征抚记》卷上记载:“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②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在上奏中也称:“盖伶仃与老万山以外,夷洋毗连。”^③李鸿宾等奏称,法国人搭乘厦门绿头船,“驶至老万山外洋寄碇”。^④清末金武祥在《粟香随笔》“二笔”卷7中称:“虎门有大小两山,称大虎、小虎,内为狮子洋,外为零丁洋。”在该书的卷8中又记载说:“伶仃洋在广州虎门外。”另据《续碑传集》记载:“虎门以外即零丁洋大海,浩瀚无涯。”^⑤依据这些史料的记载,似乎可判断伶仃洋的范围包括万山群岛以内、虎门以外的广大水域。但与魏源同时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的奏折中却有这样的表述:“外来烟船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⑥按照上述材料来看,伶仃洋的北部界限虽十分明确,但南部界限依然仍有一定的伸展空间。

因此,历史时期人们对伶仃洋海域的理解一是以伶仃山(内伶仃岛)为中心,模糊指其周围水域,这是一种狭义的认识;另一是以老万山和虎门为界,泛指其间的广大海域,对伶仃洋的认识具有某种广义的定性。从时间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即前一种认知多集中于明代和清前期,后一种观点多见于清代中期之后。而清中叶以后,鸦片走私十分猖獗,官府打击力度也在加强,走私分子愈益向伶仃洋的深海发展,人们对伶仃洋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伶仃洋海域范围的认识也呈现出逐步扩大的基本走势。

在众多关于伶仃洋的文献资料中,有关伶仃洋的称谓时常变化,明清之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3《山语》“官富山”条中的记载值得关注:“秀山^⑦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小零丁洋有二石,一乌一白,对峙中流,高可百余仞,当时以为行朝双阙,今

① 《清高宗实录》卷609,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 杨家骆主编:《鸦片战争文献汇编》第6册,台北:鼎文书行印行,1973年,第37—38页。

③ 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香山明清档案辑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 《清宣宗实录》卷4,道光八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 俞樾:《彭刚直公神道碑文》,缪荃孙、闵尔昌纂录《续碑传集》卷1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5页。

⑦ 崇祯《东莞县志》卷1《地輿志·山川》称:“虎头山,一名秀山”。